



高教资讯

2016年第6期

(总第11期)

发展规划处、高教研究中心编

2016年6月28日

本期要目

- 习近平：把科技创新摆在更加重要位置
吹响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
- “互联网 + 教育” 理念及模式探析
- 以法治引领和推动高教改革
- 地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转型七问

目 录

高教要闻.....	1
把科技创新摆在更加重要位置 吹响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	1
给科研院所和高校开展科研更大自主权.....	5
2050 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	6
中国全票获《华盛顿协议》正式成员资格我国工程教育实现国际多边互认.....	8
理论经纬.....	9
“互联网 + 教育” 理念及模式探析.....	9
高教视点.....	16
透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十三五”发展规划》	16
科研评价不是一部分人的自娱自乐.....	18
大学治理.....	21
以法治引领和推动高教改革.....	21
转型发展.....	24
地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转型七问.....	24
每所大学都有转型发展的话语权.....	28
把准转型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的方法论.....	30
他山之石.....	32
“得罪人” 的院长第一次得了优秀.....	32
不在书斋里培养应用型人才.....	35
上海教师教育创新发展中心在上海师大成立.....	36
教育时评.....	37
大学公共课如何终结“后排效应”	37

习近平出席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
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把科技创新摆在更加重要位置 吹响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

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中国科学院第十八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十三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30 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这个盛会，就是要在我国发展新的历史起点上，把科技创新摆在更加重要位置，吹响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加快各领域科技创新，掌握全球科技竞争先机。这是我们提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出发点。

李克强主持。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出席大会。

上午 9 时，大会开始，全体起立，唱国歌。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了讲话。他指出，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目标是，到 2020 年时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到 2030 年时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到新中国成立 100 年时使我国成为世界科技强国。两院院士和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国家的财富、人民的骄傲、民族的光荣，大家责任重大、使命重大，应该努力为建成创新型国家、建成世界科技强国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习近平强调，历史经验表明，科技革命总是能够深刻改变世界发展格局。在绵延 5000 多年的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闻名于世的科技成果。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不懈努力，我国科技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科技整

体能力持续提升，一些重要领域方向跻身世界先进行列，正处于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的重要时期。

习近平指出，纵观人类发展历史，创新始终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的重要力量，也始终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不创新不行，创新慢了也不行。如果我们不识变、不应变、不求变，就可能陷入战略被动，错失发展机遇，甚至错过整整一个时代。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应对发展环境变化、把握发展自主权、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必然选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破解经济发展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必然选择，是更好引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我们要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谋划，加强组织，优化我国科技事业发展总体布局。

习近平就此提出 5 点要求。一是夯实科技基础，在重要科技领域跻身世界领先行列。推动科技发展，必须准确判断科技突破方向。判断准了就能抓住先机。科学技术是世界性、时代性的，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具有全球视野、把握时代脉搏，及时确立发展战略，坚定创新自信，提出更多原创理论，作出更多原创发现，力争在重要科技领域实现跨越发展。

二是强化战略导向，破解创新发展科技难题。当前，国家对战略科技支撑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迫切。党中央已经确定了我国科技面向 2030 年的长远战略，决定实施一批重大科技项目和工程，要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着力攻破关键核心技术，抢占事关长远和全局的科技战略制高点。成为世界科技强国，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必须拥有一批世界一流科研机构、研究型大学、创新型企业，能够持续涌现一批重大原创性科学成果。

三是加强科技供给，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科学研究既要追求知识和真理，也要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实好“三去一降一补”任务，必须在推动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活力上来一个根本性转变，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性发展，大幅增

加公共科技供给，让人民享有更宜居的生活环境、更好的医疗卫生服务、更放心的食品药品。

四是深化改革创新，形成充满活力的科技管理和运行机制。科技创新、制度创新要协同发挥作用，两个轮子一起转。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要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新机制。要以推动科技创新为核心，引领科技体制及其相关体制深刻变革。要制定和落实鼓励企业技术创新各项政策，加强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支持力度。要优化科研院所和研究型大学科研布局，厚实学科基础，培育新兴交叉学科生长点。要尊重科技创新的区域集聚规律，建设若干具有强大带动力的创新型城市和区域创新中心。

五是弘扬创新精神，培育符合创新发展要求的人才队伍。科学技术是人类的伟大创造性活动。一切科技创新活动都是人做出来的。我国要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关键是要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要大兴识才爱才敬才用才之风，在创新实践中发现人才、在创新活动中培育人才、在创新事业中凝聚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让更多千里马竞相奔腾，努力造就一大批能够把握世界科技大势、研判科技发展方向的战略科技人才，培养一大批善于凝聚力量、统筹协调的科技领军人才，培养一大批勇于创新、善于创新的企业家和高技能人才。要尊重科学研究灵感瞬间性、方式随意性、路径不确定性的特点，允许科学家自由畅想、大胆假设、认真求证。要让领衔科技专家有职有权，有更大的技术路线决策权、更大的经费支配权、更大的资源调动权。政府科技管理部门要抓战略、抓规划、抓政策、抓服务，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制化优势。

习近平强调，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在全社会推动形成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氛围，使蕴藏在亿万人民中间的创新智慧充分释放、创新力量充分涌流。

习近平指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是我国科技大师荟萃之地，要发挥好国家

高端科技智库功能，组织广大院士围绕事关科技创新发展全局和长远问题，为国家科技决策提供准确、前瞻、及时的建议。要发挥好最高学术机构学术引领作用，把握好世界科技发展大势，敏锐抓住科技革命新方向。希望广大院士发挥好科技领军作用，团结带领全国科技界特别是广大青年科技人才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建功立业。

习近平指出，中国科协各级组织要坚持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的职责定位，团结引领广大科技工作者积极进军科技创新，组织开展创新争先行动，促进科技繁荣发展，促进科学普及和推广。

习近平最后强调，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才能有多大成就。两院院士和广大科技工作者要发扬我国科技界追求真理、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勇担重任，勇攀高峰，当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排头兵。让我们扬起 13 亿多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憧憬的风帆，发动科技创新的强大引擎，让中国这艘航船，向着世界科技强国不断前进，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前进，向着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不断前进。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

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各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各部门、武警部队主要负责同志和大会代表，约 4000 人参加会议。

（《中国教育报》2016 年 5 月 31 日）

李克强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九大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

给科研院所和高校开展科研更大自主权

5月30日下午，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九大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发表重要讲话。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主持会议。

李克强说，今天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强调要把科技创新放在更重要的位置，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等方面的明确要求，要认真贯彻落实。创新事关国家前途命运。几千年来，中华民族有许多遥遥领先的创新成果，对世界文明进步贡献巨大。但后来由于多种原因，我国屡次与世界科技革命失之交臂。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建立起全面独立的科学技术体系，开启了全面创新的时代。全国广大科技工作者尤其是两院院士创造了许多重大科技成果，作出了突出贡献。中国科协作为“科技工作者之家”，也功不可没。

李克强指出，当前，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孕育兴起和交互影响，创新既是我国实现“双中高”的重要支撑，也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和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的重要依托。党的十八大作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决策部署，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促进科技创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各地区各部门要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使创新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的引领型发展，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

李克强强调，要落实和完善支持创新的政策措施，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一是补好基础研究短板。加大长期稳定支持力度，到2020年研发投入强度达到2.5%，组建国家实验室和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高水平创新平台，充分发挥科研院所和高校主力军作用，调动企业和社会力量积极性，增强原始创新能力。二是

突破应用研究产业化瓶颈。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创新机制，部署推进一批体现国家战略意图的重大科技项目和工程，形成一批既利当前、更惠长远的新产业领域和经济增长点。三是大力推动协同创新。依托互联网打造开放共享的创新机制和创新平台，推动企业、科研机构、高校、创客等创新主体协同，人才、技术、资金等创新要素协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与科技创新协同以及区域创新协同，加速释放创新潜能，培育新动能，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李克强指出，要以体制机制改革激发科技创新活力。推进科技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在选人用人、成果处置、薪酬分配等方面，给科研院所和高校开展科研更大自主权。让科研人员少一些羁绊束缚和杂事干扰，多一些时间去自由探索。完善保障和激励创新的分配机制，提高间接费用和人头费用比例，推进科技成果产权制度改革，提高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分享比例。把创新精神、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结合起来，解决“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问题，打通科技成果转化通道。加大财政科技投入，改进科研活动评价机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环境。

（《中国教育报》2016年5月31日）

2050 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提出到 2020 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到 2030 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到 2050 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三步走”目标。

纲要全文约 13000 字，包括战略背景、战略要求、战略部署、战略任务、战略保

障、组织实施等六个部分。

纲要指出，创新驱动就是创新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业态创新和文化创新相结合，推动发展方式向依靠持续的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劳动力素质提升转变，促进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精细、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

纲要提出“三步走”战略目标。第一步，到 2020 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基本建成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有力支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第二步，到 2030 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发展驱动力实现根本转换，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大幅提升，为建成经济强国和共同富裕社会奠定坚实基础；第三步，到 2050 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为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支撑。

纲要指出，实现创新驱动是一个系统性的变革，要按照“坚持双轮驱动、构建一个体系、推动六大转变”进行布局，构建新的发展动力系统。双轮驱动就是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两个轮子相互协调、持续发力。一个体系就是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六大转变就是发展方式从以规模扩张为主导的粗放式增长向以质量效益为主导的可持续发展转变；发展要素从传统要素主导发展向创新要素主导发展转变；产业分工从价值链中低端向价值链中高端转变；创新能力从“跟踪、并行、领跑”并存、“跟踪”为主向“并行”“领跑”为主转变；资源配置从以研发环节为主向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统筹配置转变；创新群体从以科技人员的小众为主向小众与大众创新创业互动转变。

纲要部署了八大战略任务。一是推动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创造发展新优势；二是强化原始创新，增强源头供给；三是优化区域创新布局，打造区域经济增长极；四是深化军民融合，促进创新互动；五是壮大创新主体，引领创新发展；六是实施重大科技项目和工程，实现重点跨越；七是建设高水平人才队伍，筑牢创新根基；八是推动创新创业，激发全社会创造活力。

在战略保障方面，纲要提出要改革创新治理体系，多渠道增加创新投入，全方位

推进开放创新，完善突出创新导向的评价制度，实施知识产权、标准、质量和品牌战略，培育创新友好的社会环境。

纲要还从加强领导、分工协作、开展试点、监测评价、加强宣传等方面对组织实施提出了要求。

此外，纲要特别提出，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加快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引导大学加强基础研究和追求学术卓越，组建跨学科、综合交叉的科研团队，形成一批优势学科集群和高水平科技创新基地，建立创新能力评估基础上的绩效拨款制度，系统提升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技研发三位一体创新水平。增强原始创新能力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推动一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

（《中国教育报》2016年5月20日 作者：吴晶晶 余晓洁）

中国全票获《华盛顿协议》正式成员资格 我国工程教育实现国际多边互认

6月2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工程联盟大会上，经过《华盛顿协议》组织的闭门会议，全体正式成员集体表决，全票通过了中国的转正申请。至此，我国成为《华盛顿协议》第18个正式成员。

作为国际最具影响力的工程教育学位互认协议，成立于1989年的《华盛顿协议》，由美国等6个英语国家的工程教育认证机构发起，其宗旨是通过多边认可工程教育认证结果，实现工程学位互认，促进工程技术人员国际流动。

经过20多年的发展，目前《华盛顿协议》成员遍及五大洲，包括中国、美国、英国、加拿大、爱尔兰、澳大利亚、新西兰、中国香港、南非、日本、新加坡、中华台

北、韩国、马来西亚、土耳其、俄罗斯、印度、斯里兰卡等 18 个正式成员。

我国于 2013 年 6 月成为《华盛顿协议》预备成员，2014 年初提交转正申请，经过该组织的资料审查、现场考察和会议表决后，今年 6 月实现转正。成为正式成员后，我国将全面参与《华盛顿协议》各项规则的制定，我国工程教育认证的结果将得到其他成员认可，通过认证专业的毕业生在相关国家申请工程师执业资格时，将享有与本国毕业生同等待遇。

“正式加入《华盛顿协议》，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我国工程教育质量标准实现了国际实质等效，工程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得到国际认可，工程教育质量达到国际标准，中国高等教育真正成为国际规则的制定者，与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等高等教育发达国家平起平坐，实现了从国际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的跟随者向领跑者转变。”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主任吴岩表示，今后，我国将全面参与《华盛顿协议》的各项标准和规则制定，在各项事务中发挥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工程教育认证的中国标准、方法和技术也将影响世界。

（《中国教育报》2016 年 6 月 3 日 作者：何菁菁）

理论经纬

“互联网 + 教育”理念及模式探析

随着李克强总理在 2015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制“互联网 +”行动计划，“互联网 +”迅速成为各方面追捧的热词。12 月，习近平主席在浙江乌镇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向世界宣告：“十三五时期，中国将大力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国家大数据战略、‘互联网 +’行动计划，发展积极向上的网络文化，拓展网络经济空间，促进互联网和经济社会融合发展。”“互联网 +”作为一项国家战略，必将成为未来我国经济社会

创新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同社会许多其他行业一样，教育受到了互联网巨大的影响，“互联网+”思维对传统教育理念带来了革命性的冲击和挑战，教育如何面对和适应“互联网+”，通过探索“互联网+教育”的科学模式，促进教育公共服务水平和教育质量的提升，既是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摆在广大教育工作者面前的现实课题。

一、对“互联网+”的认识

1. “互联网+”的由来。腾讯总裁马化腾 2014 年 4 月 21 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第一次公开提出“互联网+”的概念，他认为“互联网+”是一个趋势，“+”的是传统的各行各业。在 2015 年两会上，马化腾提出了加快推动“互联网+”的建议。在这份建议中，他对“互联网+”的解释是“利用互联网的平台，利用信息通信技术，把互联网和包括传统行业在内的各行各业连接起来，在新的领域创造一种新的生态”。国内另一家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随后通过阿里研究院推出了《“互联网+”研究报告》。提出所谓“互联网+”是指“以互联网为主的一整套信息技术（包括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技术等）在经济、社会生活各部门的扩散、应用过程。”“‘互联网+’的过程也是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推动各产业的互联网化，‘互联网+’的动力在于云计算、大数据与新分工网络。”在 2015 年 7 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中，对“互联网+”的解释是“把互联网的创新成果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推动技术进步、效率提升和组织变革，提升实体经济创新力和生产力，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创新要素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形态。”这可视作目前为止官方对“互联网+”最权威的解释。

2. 不同视角理解的“互联网+”事实上，社会对“互联网+”的内涵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也很难形成共识，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人群站在各自视角，对“互联网+”都会产生不同的界定和诠释。综合各种视角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则有利于更为清晰、全面地审视和把握“互联网+”的特征。

从信息传播的角度看，“互联网+”是基于新一代互联网技术的信息革命。互联网的产生发展基于通信技术的积累和创新，而在“互联网+”时代，随着以去中心化、用户生

产内容、平台化为核心特征的 Web2.0 的出现，人际信息传播方式发生了新的变革。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核心技术的新一代互联网使每个人都成为网络社会中的一个独立的信息源，传统的中心化的信息传播的单向模式不复存在。因此，“‘互联网+’不是在传统互联网中做一点提升，而会是一次全新的信息革命，在这次信息革命中，主角要从一个传播的时代，转向智能感应的时代。”

从经济转型的角度看，“互联网+”是实体经济与互联网深度融合的经济形态。利用互联网技术，传统产业获得了进行自我变革和转型升级前所未有的机遇。互联网将不同产业领域的信息连接起来，将生产、流通、服务等环节打通，培育出新产品、新模式和新业态。目前，互联网与零售、金融、交通、教育、医疗、养老等深度融合，已经培育出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智能家居等多种商业模式和消费模式。

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互联网+”是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的有效手段。俞可平提出，“社会治理的理想结果是‘善治’，其本质特征是政府和社会多元主体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互联网平台正是搭建了一个政府与社会沟通协商合作的平台，促进普通公民等社会主体参与到开放的公共决策中。比如近年来出现的政务微博、微信和移动 APP，就有效促进了政府信息公开，提升了政府的社会动员能力和服务能力。

二、“互联网+”对教育理念的冲击和重构

互联网的普遍应用特别是大数据、云计算和移动互联等技术的发展，正深刻地改变着教育的面貌，推动教育向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方向发展，从教育视角认识“互联网+”，应当看到这场风潮带来的不仅是教育技术的革新，更是对学习、教学、组织模式的冲击及由此给教育理念和体制带来的深层次影响。

1. 教育资源——从封闭到开放。传统模式下，教育资源集聚在校园这个相对封闭的物理空间里，局限于课堂、图书馆、实验室等场所，满足固定人群的需求。而互联网以其强大的存储性和交互性的技术优势，在短时间内迅速吸纳了海量的知识和信息，成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信息库”，并且这个信息库随着由互联网终端连接起来的人们不断上传、发布新的信息而源源不断地扩容。借助互联网，教育资源可以跨越校园、地区、国家覆盖到世界每一个角落，优质教育资源的平等共享成为可能并且极为

便利。风靡全球的慕课（英文简称为 MOOCs，即大规模开放式在线课程），就是“互联网+教育”的产物。MOOCs 中的第一个 O（open）就是指“开放”，进入慕课学习基于兴趣而非身份，只要想学都可以进来学，只需注册一个邮箱就可参与，并且绝大部分课程都是免费提供。慕课在短短几年，就吸引了全球数以百万的学习者，这样快速的发展最主要得力于其开放性和免费性。

2. 教育机构——从单一到多元。传统教育以学校为主要载体，借助于“互联网+”对教育资源重新配置和整合，社会教育机构、新型教育组织依靠灵活性、免费性等优势给学校教育带来了强烈冲击，教育组织形态呈现多元化的趋势。一个例证是美国的 Udacity、Coursera、edX 等慕课平台通过提供在线课程，挑战传统大学在教育 and 科研市场中的绝对优势地位。有的慕课平台还通过与大学合作提供课程学习证书。像 Coursera 平台上专门设有 Specialization（专业）栏目，在这个栏目下只要完成一定要求的课程学习就可以获得世界顶尖大学颁发的专业证书。这必将直接冲击现行的高等教育学历制度和招生制度，促使大学的组织边界悄然发生变化。作为创新和变革的策源地，大学非但不应忽视或拒绝这种变化，而且应当从拓展社会服务功能的角度出发，高度重视和积极适应这一变化。据了解，清华、上海交大等国内名校已经开始与国内外的慕课平台展开全面合作。

3. 学习——从被动到自主。传统模式下人们需要按照学校的课程表安排到教室听课，而在互联网环境下，学习成为无时不可、无地不可的事情，只要连接网络就可以学习，不必再完全依赖于课堂和书本。学习者突破了校园的局限，真正实现了时空上的自由。比如在线课程的学习就充分体现了学习的自主性。首先学习者可以自主选择课程，进入课程学习后可以自主选择将学习的经验体会放到网上与他人分享，最后可以对学习过程和学习成果进行自我评价或者由其他学习者进行评价。自主学习的模式变革给教育带来了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方面是要适应“互联网+”时代“以用户为中心”的思维方式，构建以“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和模式。教育要真正把学习者作为服务对象，有效捕捉和满足他们个性化和多样的学习需求。另一方面，自主学习也给学习者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比如学习碎片化的问题，学习者对大量唾手可得的

碎片化信息通常只是浮光掠影、浏览而过，缺乏深度思考。再比如学习缺乏强制性的问题。互联网环境下的学习往往追求趣味化、娱乐化的体验，学习者难以有时间和耐心坐下来学习枯燥的基础知识。还比如判断甄别困难的问题，面对鱼龙混杂的海量信息，学习者尤其是缺乏判断能力的低龄学习者，如果缺乏正确的引导，难以进行有效的知识积累和加工，促进智力发展和能力提升。这些问题都需要教育以新的理念和形式来介入和解决。

4. 教学——从灌输到互动。 互联网改变了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授课模式，教师不再是知识的唯一来源，学生对教师授课的依赖性明显减弱。与之相适应，教师的作用要从教学的主导者变成学生学习的辅助者、服务者，教学要从单向灌输知识的“满堂灌”向更加注重互动对话的“翻转课堂”转变。所谓翻转课堂，主要是指课堂承载的功能发生改变，过去课堂主要是教师“教授知识”，现在教师要求学生课前在网上完成所有相关知识点的视频学习，课堂上主要是“交流和评估”也就是答疑解惑和评估鉴定学习成果。翻转课堂的出现将倒逼学校的教学模式改革，使教师面临教学策略和技能方面的挑战。如何既调动学生的实际参与，及时检查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并给予反馈，又不干预学生的选择，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对教师的理念转变和素质能力都是新的考验。

三、对“互联网 + 教育”的模式畅想

随着“互联网 + ”成为国家战略，BAT 等国内互联网大鳄纷纷布局教育，“互联网 + 教育”呈现风生水起之势。然而冷静观察形形色色的新产品新业态，我们发现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成熟的“互联网 + 教育”模式迄今还没有产生，“互联网 + ”并未给教育带来太多的实质性变化。当然，这并不妨碍我们设想和探索“互联网 + 教育”的创新模式。可以预见，随着信息科技日新月异的进步，互联网将变得更加“无所不连”，“互联网 + 教育”将不再局限于“在线教育”而是会给教育的全过程、各环节带来更多更深刻的改变，直至重塑一个开放创新的教育生态环境。

1.“互联网 + 教育内容”。 这是“互联网 + 教育”的资源基础与核心竞争力所在。慕课的出现为“互联网 + 教育内容”模式提供了创新样板。借鉴国外慕课平台的经验，未来中国慕课的探索应当更加聚焦在提高课程学习的社会认可度上。在

课程内容上更充分地发挥公共服务体系的作用，明确服务教育、面向公共需求的定位；在机制创新上，探索利用新一代互联网技术打破地域、校际隔阂，深度整合现有教学内容和在线课程资源，形成课程互选和学习成果互认的可行模式。从慕课的深度发展可以预想，未来的“互联网+教育内容”将重在探索以课程设计为核心，集成整合各类优质教育教学资源，构建教育资源的网络超市。

2.“互联网+教育体验”。“互联网+”时代，用户体验为王。对教育来说，就是要以学习者的需求为导向、以学习者的体验为核心。在精准把握学习者需求上，可以利用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对学习者的倾向、兴趣、能力、目标等进行智能分析；在满足学习者体验方面，可以通过优化“互联网+教育”产品的生产、设计和供应环节使学习过程更为简单、便捷、有趣，帮助学习者深度参与其中。“互联网+教育体验”的一个极致做法是通过教育类网络游戏实现快乐的“体验式学习”。国内已有网游公司已经着手开发教育类网络游戏，尝试把游戏的娱乐性和自主学习结合起来，为学习者创设生动的游戏化学习情境。玩家在游戏情景中可以体验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接触到的世界，而且游戏的奖励和竞争机制可以极大地调动学习兴趣，激发学习动力，持续增强自主学习的“粘性”。

3.“互联网+教育管理”。互联网技术可以有效促进教学管理、教务管理、学生管理、校园管理等各领域各环节教育管理信息的互联互通，从而减少不必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损耗，促进学校管理和服务的自动化、快捷化、个性化和智能化。作为教育信息化重要内容的“智慧校园”就是“互联网+教育管理”的产物。“所谓智慧校园”是以借助新一代的物理网、云计算、泛在感知等信息技术，打造物联化、智能化、感知化、信息化的新兴校园。”由于智能设备的普遍应用，各种监测信息可随时获取，这使智慧校园成为可能。未来，教学管理和教学状态监测、科研项目管理和科技成果转化、校务管理和学校决策支持、校园虚拟社区和人际交往平台、校园信息化生活服务和后勤管理等，都将为智慧校园和“互联网+教育管理”提供广阔空间。

4.“互联网+教育评价”。互联网应用于教育评价特别是基于大数据技术的教育评价

将带来两方面的变化：一是评价依据的丰富。“互联网+”很大程度上能够克服传统教育评价难以收集评价依据和评价信息单一化、片段化的问题，不但可以全过程、全方位采集教育数据，而且可以收集考试成绩之外的情感因素、心理倾向、实践能力等非结构化数据，从而支持综合性、系统化的评价，使教育评价的内涵和功能得到拓展。另一方面变化是评价应用的便捷。通过互联网平台，教师可以依据学习表现评价学生，学生也可以对教师的教学成效打分；学校和教育部门借助数据可以远程分析评价教学活动和学习绩效，家长也可以通过数据及时了解孩子的情况和学校的教育质量。在“互联网+教育评价”环境中，每个人都是评价的主体，也是评价的对象，社会各方面介入教育评价更为方便也更为深入。目前，云校等国内互联网教育企业已经在尝试通过挖掘管理、教学、学习的基础数据，构建科学的学生成长模型，为对学生进行系统评价创造条件。这些探索代表了“联网+教育评价”创造有效评价依据和支持保障评价应用的发展方向。

（《中国高教研究》2016年第2期，作者：张岩）

透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十三五”发展规划》

未来中国基础研究“长什么样”？

在刚刚结束的“十二五”科技创新成就展上，我国基础研究成绩备受关注：过去5年，基础研究的经费投入持续快速增长，2015年达到670亿元；数量质量同步攀升，科技论文总量连续多年居于世界第二位；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外尔费米子研究、中微子振荡等一系列为世界瞩目的研究成果涌现……

厚植科学基础，增强源头供给，对于建成创新型国家至关重要。“十三五”期间，作为资助基础研究主渠道的科学基金将会有哪些目标和举措？在国务院新闻办14日召开的发布会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下称“基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并解读了当天发布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十三五”发展规划》（下称《规划》）。

基础研究“三个并行”与创新驱动发展“三步走”战略相呼应

“‘三个并行’与国家创新驱动发展‘三步走’战略目标相协调与呼应，经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基金委副主任高文表示。

《规划》提出，“十三五”乃至更长一段时期，科学基金将助推我国基础研究实现与科技发达国家的“三个并行”，即2020年达到总量并行、2030年达到贡献并行、2050年达到源头并行。具体指，2020年我国学术产出和资源投入总体量与科技发达国家相当，学科体系更加健全，为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奠定科学根基。2030年力争中国科学家为世界科学发展作出可与科技强国媲美的众多里程碑式贡献，形成若干引领全球学术发展的中国学派，为我国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夯实基础储备。2050年对世界科学发展有重大原创贡献，为建成科技创新强国提供源头支撑。

虽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我国基础研究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如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大原创成果偏少，引领科学潮流的世界级科学家匮乏，创新文化氛

围有待改善等。

“原创的东西要想做出来需要长期的积累，量到了一定的时候才能产生质变。现在从量变到质变的转折点还没有到来，这个转折点大概出现在 2020 年到 2030 年之间，我们需要更耐心一点。”基金委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韩宇说，希望有更宽容、允许失败的氛围，支持基础研究的发展。

聚焦科学前沿 重点支持“蓝绿”学科发展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蓄势待发的今天，谁掌握了前沿技术，谁就把握了主动权。美国科学基金会近日就提出，要部署大数据、人机互动等六大前沿方向。同样，在科学基金的“十三五”规划中，聚焦科学前沿，加强战略部署也是重要任务之一。

《规划》共提出 118 个学科优先发展领域和 16 个综合交叉优先发展领域。其中，16 个综合交叉优先发展领域包括介观软凝聚态系统的统计物理和动力学、生物大分子动态修饰和化学干预、手性物质精准创造、地学大数据与地球系统知识发现等等。

《规划》着重提出，提升“蓝绿”（海洋、环境等）学科研究水平，夯实生态文明的科学基础。“我们规划出 18 个学科的发展战略，其中地球科学、资源与环境科学、海洋科学、能源科学等，都是‘蓝绿’学科的典型代表。”高文说，这些学科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因而科学基金在学科发展战略上给予重点支持，推动学科均衡发展。

高文还透露，“十三五”期间，科学基金每年将布局 600 个左右的重点项目，每个项目支持强度为 300 万元，每年支持约 20 项重大项目，每个项目 2000 万元。

加强资金监管 把钱用到刀刃上

从 1986 年的 8000 万元到 2016 年的 248 亿元，科学基金成立 30 年来，经费增长了 300 倍。如何管好用好日益庞大的科研经费？“基金委始终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切实把管好用好科研经费这份责任牢牢记在心上。”韩宇说，“十三五”期间，基金委将从完善制度体系、规范财务管理、加强资金监管等方面努力，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韩宇表示，完善制度体系，就是要通过科学、公正的评审制度，依靠专家遴选出创新的项目，保证钱真正用在坚持创新的人和方向上，通过制度建设，建立具有公信力的评审制度平台，为科学遴选创新项目和人才孕育创新思想提供制度保障。

“在钱的具体使用上，我们要规范财务管理，健全安全、规范、高效的科学基金财务管理体系，在内部管理方面做到每一笔账目都痕迹清晰，资金流向明确。”韩宇说，在财务管理方面，要加大力度，完善间接成本补偿机制。

在资金监督方面，韩宇表示，会在经费的使用上少干预，但在经费的管理上按照最小化原则，以抽查、审计的方式对经费使用进行总体把握和判断。

（《科技日报》2016年6月15日）

科研评价不是一部分人的自娱自乐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大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逻辑起点和五大重点任务，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要求，强调了科技的根本任务。

科技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科技管理和运行机制同样也是一个系统工程。在科技创新活动中，正确评价科技创新成果价值，是提升科技创新质量、引导科技创新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激发创新活力和创新激情的重要保证，也是科技管理体制机制改革的重中之重。

容忍失败，给科研足够的自由度

评价科技成果，只有评价准确，才能有利于调动和激发广大科技工作者自身的潜能和创造力，对科技创新起到推动作用。通常情况下，创新具有很大的偶然性，是无章可循的，创新成果的评价也会因科技活动的类型或科研项目的种类不同，评价者诉求不同，而有不同的评价结果；而评价的公正合理性不仅会影响成果水平的认定，更会直接影响到科技工作者的工作热情和创造能力。因此，科技评价不仅成为创新管理的重要环节，也是科技管理体制机制改革的重中之重。

现行的科技评价和科研管理方式，是从工业管理方式模仿出来的，目标、经费、

甚至研究进度都计划得非常死板，这不符合科技创新的规律，势必影响创新的质量。科研活动与工业生产截然不同，科研评价不能仅靠期刊影响因子和论文数量。科研管理要给科研人员足够的自由度，要宽容科研失败。并非每项科学研究都必然成功，试图按照计划方式获得科研结果，搞不好就导致学术不端。

科技评价要实行分类评价，科技评价改革要根据不同类型科技活动特点，建立导向明确、激励约束并重的分类评价标准，营造潜心治学、追求真理的创新文化氛围。要注重科技创新质量和实际贡献，重点突出围绕科学前沿和生产实际需求催生重大成果产出的导向，着力提升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的原始创新能力，关键共性技术的有效供给能力，支撑高质量创新人才培养的能力，服务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需求的能力。

科技评价分类要针对科技活动人员、创新团队、平台基地、科研项目等不同对象，鼓励科技人员在不同领域、不同岗位做出特色，追求卓越。按照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转移、成果转化等不同工作的特点，分别建立涵盖科研诚信、创新质量、学术贡献、人才培养、科学普及与开放共享等内容，科学合理、各有侧重的评价标准。

对不同类别科技项目的评价，要制定科学合理的评价标准。基础研究项目要以原始创新性成果和创新性人才培养为评价重点，着重评价科学价值。应用研究项目要以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突破、自主知识产权成果、经济社会效益等为评价重点，着重评价目标完成情况、成果转化情况以及技术成果的突破性和带动性。产业化开发项目要以技术、产品的成熟度和市场反应为评价重点，着重评价对产业发展的实质性贡献。

保证评价结果的独立公正

科技创新具有两个本质规律，一是研究人员将科技新发现及时转化到课堂上，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二是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

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是解决好科技与经济社会、与人才培养相互脱节问题的关键，同样需要改革现有的科技评价方式。有人形象地把科技成果比作一块冰，如果总是把科技成果“捂”在手里不转化的话，这块“冰”很快便会融化而变得一文不值。因此，我们

必须认识到科技成果的时效性，以及科技成果转化的急迫性，转变观念的重要性。

传统意义上理解科技成果转化，就是指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这其实很不完全。事实上，并不是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不能产业化的科研成果就没有意义。因为对大多数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来说，其成果是不能够直接产业化的，但这类成果可以知识化，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国民科学素养。

应用类研究和产业化开发项目，应建立主要由市场决定技术创新项目和经费分配、成果评价的机制，强调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技术转移推广等科技产出在评价中的作用，由用户、市场和专家等相关第三方参与评价。基础类研究以同行评价为主，重点评价创新质量和学术贡献，大力加强国际同行评价。提高科技评价工作的效率和开放程度，充分利用互联网等公开数据，引入公开数据占一定比例的权重评价方法，让学术界公开参与评价。

科技评价既是科技管理的工具，是对科技活动进行规划、决策、管理、监督的手段，也是学术共同体对科技发展内在、基本的学术认识活动，是对科研产出和影响的价值判断。科技评价既要减少计划的成分和政府主导，也要防止科技评价成为一部分人的自娱自乐，科技评价要逐步建立开放评价机制。科技管理部门要完善公平、公正、公开的开放评价规则，制定和完善评价答辩、公示、反馈、申诉、举报和回溯评价制度；加强开放、多元的国内外专家数据库建设和共享；健全随机、选准、回避的评价专家遴选机制；健全评价专家责任和信誉制度，增强评审专家的社会责任感；保证评价工作的独立性、公正性和评价结果的科学性、客观性。

总之，正确的科研成果评价的核心目的是提高科研的质量，把鼓励原创性，研究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亟须解决的问题，作为科研评价的首要原则。（作者系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任）

（《中国青年报》2016年6月8日 作者：李志民）

以法治引领和推动高教改革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解读新修订高等教育法

新修订的简称高等教育法6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法在高等教育办学方针、人才培养、高校设立、学术委员会职责、评价制度、经费筹措等方面，做了7处修订。为什么要做这些修订？这些修订将对高等教育带来哪些影响？就这些疑问，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授接受了中国教育报记者专访。

自1999年1月1日至今，高等教育法已经施行17年，在这17年里，中国高等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是高等教育的规模、质量、教育管理体制、大学治理结构，还是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都发生了改变。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要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深化高等教育改革，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高等教育法应该修改和完善。”在马怀德看来，高等教育法涉及内容很多，从修改的内容来看，此次修改有非常强的现实针对性，是根据高教的现状和问题，针对当前的急需和特殊要求进行的修改。

明晰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

马怀德将此次修订的7个法律条文归纳为5类。第一类是对高等教育方针和任务做了补充和完善。

高等教育法第四条，将基本方针增加三部分内容，一是增加“为人民服务”，二是增加了要“和社会实践”相结合，三是受教育者发展内容方面增加“美”。

“这样就比较完整了。”马怀德表示，从高等教育发展现状来看，首先，要引导培养学生树立人民利益至上的观念，从教育的价值理念来讲，所以增加“为人民服务”；从培养内容上来看，应用型人才在人才培养结构中占有重要比重，他们必须要与社会需要相适应，要增加“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在培养规格上，美育也很重要。

与之相关的是，第五条关于高等教育的任务，在人才培养目标中，增加“社会责任

感”的要求。“这是非常必要的，人才培养要以德为先，立德树人最重要的内容就是社会责任感，此次修改符合现代教育观和高等教育发展导向，也符合问题导向。”马怀德说，现在培养的不少人才缺乏社会责任感，这是需要引导的。

下放设立高校审批权限

此次修订内容第二类是高教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完善。高等教育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将设立高等学校的审批权一分为二，分类审批，以放权为主，规定设立实施本科及以上教育、专科教育的高等学校，分别由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省级人民政府审批。

为何要将审批权下放？在马怀德看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是新一届政府深化改革、开创新局的施政策略，也是今后一个时期深化职能转变工作的“着力点”。

“之前的教育管理体制权限比较集中，对设立高校的授权，也不是特别明确。此次教育行政审批权下放，符合简政放权的要求，有利于释放市场的活力，激发设立高校的社会意愿，对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用市场的方式和社会资源力量推动高等教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马怀德表示。

第二十九条第二款明确，审批高等学校的设立，将应当“聘请”改为“委托”由专家组成的评议机构评议。马怀德认为，这也是政府职能转变的体现，让专家组成的评议机构有了更明确的权限范围。

强化高校学术委员会作用

新法修订的第三类内容是在高等学校的组织和活动方面，细化和明确高校学术委员会的职责，第四十二条，明确学术委员会有5项职责。

“之前也有规定，但比较简单，此次明确规定学术委员会有5项职责，其中，审议学科、专业设置，教学、科学研究计划方案，以及评定教学、科学研究成果，这两项是之前就有的，这次增加调查处理学术纠纷、调查认定学术不端行为，以及按照章程审议、决定有关学术发展、学术评价、学术规范的其他事项等3项职能，其中最后一项是兜底条款。”马怀德介绍说。

为何要明确学术委员会职责？在马怀德看来，这是为了适应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

需求，也是高校内部治理结构改革成果的体现。

“教育规划纲要实施之后，高校在进行内部治理结构的改革和探索，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强化教授治学，分清楚高校内部几类不同的权力和责任，强化学术委员会履行学术职责，比如，学术不端问题，处理学术纠纷，就是专业和学术问题，由学术委员会履行职责，更能体现教授治学，增强教授的使命感、责任感，调动教授在内部治理体系中的作用。”马怀德表示。

完善高等教育评估体系

改进高等学校评价模式，完善高等教育办学水平和质量评估体系，是此次修订的第四类内容。第四十四条明确，高校应建立本校办学水平、教育质量的保障与评价制度，教育行政部门负责组织专家或者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对高等学校的办学水平、效益和教育质量进行评估。

马怀德表示，这就明确了学校在办学水平、教学质量评估方面的权限，同时，还规定要及时公开相关信息，接受社会监督，这有利于高等教育办学水平和质量的提升。

此外，此次修订还在高等教育投入机制和营利问题上有了制度性突破。第六十条，对教育经费机制进行调整，明确举办者、学生、学校三方都要付出和投入，要实行以举办者投入为主、受教育者合理分担培养成本、高等学校多种渠道筹措经费的机制。

为了与民办教育促进法修订相衔接，第二十四条删除设立高等学校，不得以营利为目的的内容。马怀德表示，这也意味着国家财政将主要关注普及教育、义务教育，其他的教育领域将慢慢引进一些社会资本，向社会化方向发展。高校投入是多元的，办学形式也应当多元。今后，营利类高校就要按照企业的方式进行运行和管理，其属性、定位及责任更加明晰。

（《中国教育报》2016年6月1日 作者：万玉凤 柯进）

地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转型七问

“向应用型转变”，已成为近年来高校转型发展的一个热点。但由于对“到底为什么转”“转什么”“转到哪”“怎么转”“谁来转”等问题缺乏深入研究和理性思考，如何回答和破解这一难题成为政府、高校和学界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

2014年5月2日，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校转型，重点举办本科职业教育。2015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引导部分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2016年3月5日，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推动具备条件的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

“向应用型转变”，已成为近年来高校转型发展的一个热点。但由于对“到底为什么转”“转什么”“转到哪”“怎么转”“谁来转”等问题缺乏深入研究和理性思考，如何回答和破解这一难题成为政府、高校和学界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

一、什么是转变？

转变就是改革，就是创新。向应用型转变不是单项的、局部的改革，它是在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进入到攻坚期、深水期的新形势下，从全局、整体、系统的角度设计、实施和推动的，从观念到模式全方位的综合改革。向应用型转变不是单向的创新，它是对我国高等教育理念、体制、模式和方法的全面创新，是全面系统的创新，是需要高校人人参与的创新，是大众创新。

二、为什么要转？

我国高校的转型发展，实质上是高等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后，由于高校趋同发展导致高等教育结构不合理，学科专业结构不合理导致人才培养质量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高校为了适应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一新的发展形势，不得不作出被动转变。同时，这也是高校为了破解趋

同发展难题、获得更好发展，在积极寻求特色发展强烈动机下主动作为的一种自觉选择。

1997年，安徽27所高校中，三分之二是专科，三分之二是师范类院校，高等教育规模小、数量少、层次低、底子薄、结构不合理。1997年，安徽省委、省政府提出“刻不容缓地发展高等教育”，全省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大，但规模扩张导致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多样化需求与高等教育趋同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2003年，一批新建本科院校大胆提出地方性应用型办学定位，全省自下而上开展向应用型转变的探索和实践。2008年，安徽省提出“科学定位、分类指导、多元发展、特色办学”的发展方针，创立应用型本科高校合作联盟；2009年开展省级示范性应用型本科高校立项试点建设，拉开了应用型高等教育体系建设的序幕。2014年，安徽省牵头成立长三角应用型高校联盟，安徽转型的成功经验成为联盟抱团发展的典范。

三、转到哪里去？

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深度发展，高校趋同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多样化需求的矛盾日益突出，转型发展已经成为中央、地方和高校的基本共识。但到底转到哪里去，是转成职业本科教育，还是在高等教育框架内的改革创新？是转为应用技术类型，还是应用科学型？不同观点表明大家对“转到哪里去”的思想认识尚不一致，对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对高等教育本质属性认识还存在差异。

一所学校区别于社会组织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就是人才培养和知识传承。一所高校区别于其他学校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就是知识传承与创新和创新人才培养。创新是一所高校的灵魂。对高校而言，从过去的学术型向应用型转变，有人提出把本科转为职业本科，这是值得商榷的。高等教育的本质是创新性和学术性，它培养的是创新创业人才。职业教育的本质是为就业服务的，是就业教育。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就业是高校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就业率和就业质量成为考核高校的一个重要指标。这是必须的。但是，因此而抛弃创新性和学术性是错误的。完全用就业指标来评价高校与职业学校的办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的高低，也是错误的。

对于一所高校到底是学术型大学还是应用型大学，主要看学术性和应用性哪个起决定作用。从学术性和应用性的关系看，学术水平越高，其应用能力也越强，应用型大学要提升应用水平，也要从提高学术水平开始。两者区别在于起决定作用的性质不同；人才培养的目标不同；教师的素质要求不同；学术成果的转化情况不同，学术型大学学术成果转化率低、转化周期长、应用范围广、成果价值高，而应用型大学学术成果转化率高、转化周期短、适用范围小、价值相对较低。学术性、应用性都是高等教育的本质属性，内在统一于任何一所高校。所以，高校向应用型转变，应该是高等教育范畴内转型发展，并不是转变为其他类型的教育。

四、谁转变？

毫无疑问，高校是转变的主体，是转变的内在因素。中央政府要为高校转型发展提供政策和经费支持，通过实验区和示范区建设，引导高校分类发展。地方政府要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通过建立应用型高等教育体系，对接服务引领地方产业发展和升级，引导和推动地方高校向应用型转变。高校转型发展，学校领导的转变是关键，教师转变是基础，促进学生的转变是最终目标。

五、转变什么？

在推进高校转型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应着力做好六个转变：一是将发展目标转到构建应用型高等教育体系上；二是将转型的重点转到加强内涵建设和质量提升上；三是将高等教育结构转到对接经济发展上来，为经济的转型升级提供人才和技术的支撑；四是将培养体制转到部门联合、教产融合、校企合作上；五是将教育教学改革转到提高大学生实践能力、创新创业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上；六是将评价转到本科教学审核评估上。

学校作为办学的主体，需要从发展目标、发展方式到评价机制进行全方位转变。重点是将办学定位转到地方性、应用型上，将人才培养目标转到应用型、复合型人才上，将培养模式转到校企合作“五个引入”上，将学科专业结构转到支撑和引领地方产业发展上，将师资队伍转到“双师、双能型”素质上，将课程建设转到“模块化”上。

教师作为高校发展的核心要素，是学校向应用型转变的基础。教学观从以教师中心向学生中心转变；教学内容从知识传授为主向能力的培养为主转变；教学模式从传统第一课堂向第二课堂、企业课堂、社区课堂、网络课堂和国际课堂全面延伸转变；教学方法从满堂灌讲授向组织研讨、指导启发转变；评价方式从教师教得好不好向学生学得好不好转变；教师素质从理论型向“双师”“双能”型转变。

促进学生转变是整个转变的目标，学生既是转变的要素，也是转变的受益者。学生的转变，要在态度上解决学生愿意学的问题，由“要我学”向“我要学”转变；在方法上解决学生想学的问题，由“你教我学”向“我学你教”转变；在内容上解决学生会学的问题，由学知识向学本领转变；在动力上解决学生好学的问题，由为父母、为自己学向为社会、为国家学转变；在手段上解决学生处处可学的问题，由单一的第一课堂学习向处处可学转变；在目的上解决学生学有所成的问题，由单纯的知识学习向不断创新转变。

六、怎么转变？

怎么转是高校向应用型转变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难点，涉及理念、体制、评价等全方位转变。因此，必须用改革的思维，综合改革的模式全面推进。紧紧围绕培养创新型人才根本目的，以开放合作为前提，以思想观念改革为先导，以评价机制改革为突破口，以体制改革为关键，以教学改革为内核，以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为中心，着力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用现代化的治理体系保障学校顺利转型。在转变的过程中，要更加注重顶层设计，更加注重持续推进，更加注重分类指导，更加注重示范引领，更加注重转变与提升相结合，更加注重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逐步走出一条全方位、成体系、标准化、有特色的应用型高等教育发展之路。

七、怎么评价“转变”的成效？

转型得好不好，方向对不对，成效如何，怎么评价？首先是看历史、看过程，转得早不早，是否具有一贯性，用历史的眼光审视转变的深度和厚度，有了厚度、有了积累，也就有了更加牢固的根基；最重要的是看效果，用以“五个度”为主要内容的审核评估来检验转变的深度和广度。“五个度”，即高校办学定位和发展目标与社会需求的符合度，高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对办学定位和发展目标的

支撑度，高校人才培养目标、方案、教学运行、质量及质量监控之间的吻合度，高校师资队伍、教学仪器设备、实践教学基地、图书资料等教学资源对人才培养的保障度，学生、社会、用人单位、政府对教学质量的满意度。这种内容的设计，突出了高校办学的开放性、人才培养为社会服务的现实性，突出了高校办学必须紧密结合社会经济发展并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

回顾安徽省高等教育转型发展历程，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时期，在不改革就死路一条的形势所迫下，高校采取的一种自救行为。向应用型转变，也是安徽省紧紧抓住现代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紧密结合，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大势下，主动思考、主动谋划、主动作为的结果；是安徽省委、省政府加强顶层设计和政策引导，用改革思维和综合改革的模式，以高校为主体实现的一种系统性转变，实现了安徽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探索出一条真正符合安徽高等教育发展实际的特色之路。

（《中国教育报》2016年4月13日作者：储常连，系安徽省教育厅高教处处长）

每所大学都有转型发展的话语权

高等教育转型发展是“摸着石头过河”，“过河”是最终的发展目标，而“摸石头”是对改革转型的探索。探索就应该允许失误，参照现代西方教育中的“尝试错误”理论，高等教育转型发展应积极建立容错机制。社会和企业对于高校转型发展，不能总抱着观望态度，而要予以切实的支持和应有的包容。

高校在转型发展中如何处理与企业的关系，过去和现在，都是学校千方百计去找企业，这种态度很积极。可一旦我们培养的人才、研究的课题跟企业“不对味”，效果就会不佳。最好的状态，就是“企业来找学校”，这意味着，我们的人才培养、产品研发、技术革新都是企业迫切需要的。简单来说，就是要改变过去“剃头挑子一头热”的状况，而努力实现学校和企业的“共赢”。

只注重“共赢”行不行？当然不够。在高校与企业合作谋划转型发展过程中，尤其要坚持“教育性原则”。别看有些企业风风火火，对校企合作、产学研一体化兴趣盎然，实则是想借助高校优势谋不当之利。因此，我们在校企合作中应高度谨慎，不管什么时候，都应该牢记教育是为了“培养人”。

当前，高等教育的转型发展，面临着不小的阻力。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思想认识落后和僵化，使得“重学术、轻应用”成为办学者的主导思想，“求统一、排斥多样化”成为影响教育政策制定者的主导思想；二是某些政策产生了错误导向，导致以往办学重知识而轻能力，脱离了形势需求，落后于现实发展的需要；三是我们对高等教育转型发展的理论创新不够、经验积累不够、宣传推介不够，使得大家不明所以，难免感到焦虑、无所适从。

转型发展虽是当下高等教育发展的共识，但仍存在觉得“不必转型”的倾向。比如：一些地方性的工、农、医、经、管性质的学校认为，自己本来就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的，不存在转型问题；低水平的要转型，高水平的应当向学术型方向发展；工、农、医、经、管性质的学校可以转，文理类学校只能培养学术型人才等等。转型发展涉及高校多达数百所，类型、层次又不同，所以我们强调的是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不同速度的转型发展。

高等教育转型发展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探路：

体制机制转变，可以借鉴德国建立应用型科技大学的案例。需要从投资体制、招生体制，职称、奖励、话语平台等机制的转变上下功夫，并要保证所有大学都公平地拥有改革发展权，每所大学都具有转型发展的话语权。

课程与教学的转变，应用型创新人才通过应用型专业培养，应用型专业由课程体系构成，课程体系中的专业链要与产业链对应。课程、教材是转型发展的核心，传统的学术型精品课程、统一教材要转变为应用型课程和教材；传统的“以教为主”的传授方法，要转变为“以学为主”、课堂教学与实训并重，将教学、科研融为一体，以创新推动产学研的深度融合。

专业教师队伍建设，要有计划性、针对性地培养和发展双师型（双能型）专业课程教师队伍。首先，老师要同学生一起参加实训基地的学习与劳动；其次，老师要多到对口的企事业单位挂职，并承担实际责任、锻炼才干；此外，学校应外聘对口企事业单位的工程师、技术员等到校任教并给予必要的帮助。

广西现在拥有非常好的转型发展条件，各个高校也没有好高骛远，而是立足于服务广西。比如玉林师范学院在保持教师教育优势和特色的同时，通过学科专业调整优化，逐步实现专业群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及产业链的紧密对接，有序推进转型发展，积极而又稳妥。这类地方高校容易放下身段，克服“理念抵触”的弊端，积极通过转型发展，来赢得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有为”和“有位”。

（本文为潘懋元先生在玉林师范学院举办的“广西应用型高校建设与转型发展高峰论坛”上的演讲。《中国教育报》2016年06月20日）

把准转型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的方法论

地方本科院校向以应用型为核心特质的新型大学转型，迫切需要推进外部和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就新型大学的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而言，在正确认识和把握转型与改革的若干关系的同时，还要善于准确把握好转型与改革中方法论层面的若干问题。

第一，符合共性还是体现特殊性？新型大学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其他改革一样既有其共同性又有其特殊性，也就是说，既要遵循一般改革的基本原则、高等教育发展规律、高校办学与人才培养的基本规律，又要能够顺应院校转型发展的大势，要符合“地方性、应用型、开放态、重特色”的办学定位，能够支撑和保障院校发展的战略目标与主要任务。这一改革的特殊性从高校自身来说，应当聚焦和体现在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体制机制改革与创新上、实施产学研合作的新教育模式上、开展应用型科研与提升服务能力上、有利于建设双师双能型师资队伍的指导向上。

第二，顶层设计还是摸着石头过河？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已成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方法论。顶层设计意味着对改革的系统思考、整体谋划、宏观布局，摸着石头过河意味着对一定时期改革关键问题的把握、困境难题的探索和重点部位的突破。改革鼓励在整体谋划中寻求重点突破，在理念创新中开展实践探索。在实践中，一些院校的综合改革成了各个单项改革的综合与累加，缺乏系统思维与整体设计，忽视了改革及其涉及到的各个方面内在的关联性、系统性、整体性，使综合改革成为了碎片化的改革的综合。比如说，有些院校制定了向应用型转型发展方案，而没有制定相应的学校综合改革方案，或者制定了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方案，没有制定与之匹配的师资队伍建设、科研管理体制、资源配置改革等一系列方案，使得单个的方案在实践中缺乏呼应和支撑，难以有效推进，往往不了了之。

第三，整体推进还是重点突破？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是局限于学校发展与改革中的某些个别问题，而是同时涉及到学校全方位的转变，需要选择局部推进、重点突破再到全面推进的策略。也就是说，改革要坚持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渐进和突破相促进，要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新型大学校内管理体制改革的涉及高校转型发展、建设改革的各个方面，其中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不外乎两个层面。一是内部治理结构层面的改革，可以说是改革自身的顶层设计，主要涉及以下方面：省市共建地方高校机制、校政行企合作办学机制、校政行企协同育人机制以及校院两级管理体制、内部组织机构设置等方面的改革；二是学校内涵建设层面的改革，更多地侧重院校改革的实践层面，主要涉及人才培养管理体制、师资队伍建设与评价、科研管理体制、教学质量监控体制、人事制度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如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一直是新型大学改革的重点、难点，可以此为突破点，带动学校人事师资、学生工作、服务保障等方面的系列改革的推进与落实。

第四，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就高校内部管理体制而言，自上而下的改革推进往往与事关重大重要领域、紧要迫切问题相关，这种方法的改革具有较强的行政性和较高的管理效能，但也会因为对基层单位情况不明或过于强势的组织推进引起消极甚至逆反心理。国外创业型大学组织转型发展的案例给我们的启示是：大学的转型改革，

有些是先从大学的基层单位和整个大学的若干人开始的，他们通过有组织的创新，经过若干年的努力，逐步影响和改革大学的结构和方向，因此教师或教师群体能够启动或推动一所学校的转型发展；教师是学校办学的主体，也是教学改革的主体，在学校有了顶层设计以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真正落实和推动需要依靠更多的教师参与；同时，大学发生转型不会因为单个创业者获得权力，从上而下办一切事情，大学的重点都在基层，抵抗力往往自下而上，离开了教师的认同和参与，少数人的改革往往难以成功。

（《中国教育报》2016年6月13日，作者：顾永安）

他山之石

齐鲁工业大学向二级学院下放10项权力，有些院长有权不敢用，敢用权的却“叫好不叫座”，在考评中屡次被评为“合格”，如今这样的现象变了——

“得罪人”的院长第一次得了优秀

在考评中，每次都是“合格”的李天铎，前不久终于第一次获得了“优秀”。

齐鲁工业大学机关处室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自2011年李天铎担任化学与制药工程学院院长以来，主推多项改革，却“得罪”了学院个别教师，导致按照传统的考评办法对中层干部进行考核时，每年都有个别教师给他打低分，在学院班子成员考评中，他年年排名在倒数的位置。

在多项改革中，争议最大的，就是在全院推行课程优化改革。

李天铎所在的学院，一名学生从大一入学到大四毕业，要学二三十门专业必修课。经过调研，李天铎发现，由于缺乏激励机制，这些专业课质量参差不齐，授课教师不

论课上得好坏，拿的课时费都是一样的。

学院领导班子决定，要对此进行改革。

根据改革方案，每个专业挑选保留 5 门核心课程，其他的专业必修课均改为选修课，并砍掉选课人数少的课。每门核心课程配备两名骨干教师，绩效工资向他们倾斜，核心课程的骨干教师系数是 2，主讲教授为 3。

这意味着，花同样的时间教一门课，如果普通教师的课时费是 40 元的话，骨干教师可以拿到 80 元，而主讲教授可以拿到 120 元。

改革推行开来，所有教师不得不对自己的授课内容进行精心准备。一方面，要尽量争取当“骨干”；另一方面，要努力争取学生的青睐。

教师们更累了，但学生却受益了。最直接的结果是，今年全院约 240 名毕业生，绝大多数都拿到了两三个就业意向。

“学生就业率非常高，我们现在更多的是追求学生在工作单位的稳定率，让用人单位找到好用的，让学生找到喜欢的。”李天铎说。

敢于在全院主推涉及面如此广、力度如此大的改革，李天铎的底气来自学校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的。

2014 年，为进一步理顺学校与二级学院的责权关系，充分发挥学院自主办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落实二级学院办学主体地位，齐鲁工大试行了旨在释放办学活力的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的，切实将 10 项涉及“人财物”的权力下放到二级学院，推进管理重心下移。

随之而来，用人自主权、考核权、课程设置自主权、经费津贴分配自主权、专业建设自主权、人才培养模式自主权等一系列权力，都下放到了学院领导的手里。

尽管这些“大权”都放了下来，但由于改革会触动利益格局，有些学院的领导手里“有权”却不敢轻易用。

敢于改革的李天铎“叫好不叫座”，学院办得红红火火，个别教师却不认可，年年只评他“合格”。

李天铎的心酸，学校领导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也一直在思考解决办法。

“像李天铎这样敢干事、能干事的改革者，我们在考核上却体现不出来，这不是这个人不行，而是我们的考核办法出了问题。”齐鲁工大党委书记张士昌反思道。

今年，在学校党委的主导下，学校对中层领导干部推行整体考核制——个人考核与单位考核挂钩，单位获得“优秀”，则对应的负责人也是“优秀”，所有参与者根据本部门单位的责任清单、服务清单以及特色创新项目进行现场述职，现场实名打分，不善言辞的李天铎也终于在这次考核中，获得了他迟来的“第一次优秀”。

校长陈嘉川介绍说：“除了‘优秀’的名分，为了鼓励学院积极改革，学校还坚持多劳多得、优劳优酬、绩效优先、公正公平的原则，根据学院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对完成任务优异的优先增加经费、编制数量、职务岗位和职称名额等奖励。”

李天铎高兴得不得了，这位年富力强的“泰山学者”逢人就说，改革也让改革者获得了看得见的实惠。

张士昌则表示，要让这样的“优秀”成为常态：“权不能一放了之，放权之后，要对权力的使用进行宏观管理。不仅要监督，引导学院建立起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运行机制；更要鼓励，并且要在学校层面从制度上提供保障，在实践中对制度适时加以调整和完善。”

“加强学院办学自主权是一项系统工程，既要积极谋划，又要稳步进行。学校目前正在紧紧围绕改革目标，突出重点，先易后难，循序渐进，逐步实施。”张士昌说。

（《中国教育报》2016年5月28日 作者：王强）

不在书斋里培养应用型人才

“大学里，最让我骄傲的就是，我是《黄山日报——大学生生活》编辑部的一员。要知道，这份报纸全部由我们学院的学生来编辑制作。”黄山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学生王小雨骄傲地说。

2014年5月，为顺应应用型本科高校转型需求，黄山学院把原隶属于艺术学院的广播电视编导、播音主持以及文学院的新闻学、戏剧影视文学等专业组建成立全新的文化与传播学院。

在新闻、文化类专业一片唱衰声中，黄山学院此举意欲何为？黄山学院院长汪建利说，成立文化与传播学院并将其确定为应用型人才培养改革试点学院，是为了走出一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新路子。

试点，绝不是说说而已。文传学院成立后，包括理论教学、实践实训、毕业设计（创作）等在内的教学改革全面实施，通过实践课堂、专业社团、创新创业实践平台、专业实践团队、专业班主任制度等多方面的建设，加大课外实践教学力度，培养学生动手动脑能力。改革的初衷是打通4个专业之间的壁垒，真正培养应用型复合式人才。在课程设置上，进一步“接地气”，依托黄山独特的人文地理资源，开设了“旅游新闻写作”“徽州地方戏剧创作”“旅游风光摄影”等特色课程，带领学生走入黄山百家摄影点、风景区实践实习。仅2015年下半年便开设实践课程11门，覆盖20个教学班，选课人次达到1711人次。“‘专业互通、实践提升、校地合作’的应用型复合式文化传播人才培养模式，成效已经显现。”该学院副院长何村说。

课程改革之初，适应了传统教学模式的教师们明显表现出“水土不服”。开展教育思想大讨论，让部分教师先试先行，看到了改革成效的教师们一步步地追赶上来。为了让教师更“接地气”，一方面，学院坚持走出去，共有9名教师到企事业单位挂职参加实践学习，建立教师应用能力工作站3个，3名教师已被认定为双能型教师；另一方面，积极引进行业一线专家或资深从业人员担任专业课教师，学院从安徽省广播电视台、安徽日报社等专业传媒机构聘用了15名一线资深专业人士担任授课教师。

如今，该学院借助自己创办的《新安江晨报》、《南岸》杂志、徽州文化网及“我的校园”微信、微博等媒介传播平台，让更多学生参与全媒体实践训练；借助微电影创作基地，组织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学生创作、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学生拍摄系列剧，让学生不出校门就能直接参与社会实践。多个实践平台的建设，使学生的创新能力、应用能力得到明显增强。

（《中国教育报》2016年4月13日）

上海教师教育创新发展中心在上海师大成立

上海教师教育创新发展中心近日在上海师范大学揭牌成立，汇聚优质资源，开展基础教育理论研究和中小学教育教学实践，推进教师专业发展。

该中心将建立协同培养机制，探索大学、政府、中小学三方联动机制。完善特聘教授制度，构建由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名师、区县教师进修学院教研员等组成的兼职教师队伍，参与卓越教师的培养。加强附属学校管理，探索基础教育合作办学的体制机制，体现上海师大附属学校优质品牌的辐射效应。

此外，上海教师教育创新发展中心还将响应国家教育综合改革战略，构建和完善市内外基础教育服务体系，协调专家深入中小学进行教科研指导，立足上海、辐射长三角、支援边远地区，增强在服务基础教育领域的影响力和辐射力。

（中国教育新闻网 2016年5月30日 作者：董少校）

大学公共课如何终结“后排效应”

大学公共课的“后排效应”，顾名思义是指大学生在上公共课时偏爱扎堆坐后排，导致前排出现一大片空座位的现象。

诸如中国近代史纲要、英语、军事理论等大学公共课，一直难以博得大学生的青睐。在这些课堂上，坐在前排的同学寥寥无几，“后排效应”非常明显。有的学生为了抢占教室最后几排的座位，甚至早早来到教室，以至于有些迟来的同学为自己“不得不”坐在前排深感恼火。

前坐空后排满，把学生和老师的距离拉得更远了。这无形中反映出学生对公共课的态度。

一方面，很多学生从心底里觉得公共课无关紧要，它们不仅与专业技能、知识无关，有些科目还采取开卷考试形式。即便不开卷考，授课教师在考前也会给学生“划重点”，把讲课时的课件提供给学生，因此，认为公共课听与不听都无所谓的学生不在少数。

此外，公共课理论知识较多，学生难免认为课堂内容枯燥。本就与专业无关，再加上味同嚼蜡，这样的公共课的确难以提起同学们的兴趣。但大学里的公共课并非全都枯燥无味。例如大学“两课”（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品德课）部的教师大多有丰富的科研经历，熟悉本领域的历史案例和新闻事实，上课时案例层出不穷，颇有滋味，但却依然难逃学生的“冷遇”。

之所以如此，在于公共课教师并非分属于各个院系，教师资源有限，因此往往是一位教师在大教室中向整个院系，甚至几个院系的学生授课。本就“一对多”的课堂模式中，师生比例变得更小，教师难以顾及全部同学。学生对这一点心知肚明，他律感和自律意识也就自然而然地降低了。于是“前排”成了“后排”的天然屏障，不在老师的“眼皮底下”，学生们在课堂上睡觉、听歌、玩游戏、发短信、看课外书，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么。而一些老师也是抱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心态，对“开小差”并不严加管束。可叹的是，当一半以上的学生都在“开小差”，讲台上的老师显得额外“孤单”，一句又一句的“认真听课”几乎起不到任何作用。

大学公共课要想终结“后排效应”，应当让学生认识到，公共课绝不仅仅是两三个学分价值，而是在培养大学生思维方式、逻辑能力、人文素质、道德法律意识等基本素养中，起到了不可代替的作用。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科学方法论，乍看起来枯燥无味、让人头痛，实则能够活跃学生的思维能力。

从授课教师的角度来看，提升课堂趣味性、抓住学生兴趣至关重要，授课内容不仅要有理论知识，更要结合充足的案例。如果老师在授课中既展示出学者的渊博，又具备“段子手”的幽默，必然会受到学生的热捧。

为了追求“简约”而采取“一言堂”的老师，还应当增加与学生的互动。有的老师会采取堂测、随时点名提问等方式来纠正学生的不良习惯。尽管堂测、提问、点名是学生“仇视”的“老师三宝”，但师生互动能有效集中学生的注意力、提高学习效率，也实实在在地提高了学生听课的积极性。而让学生放任自流，并非教师对待课堂的正确态度。

（《中国青年报》2016年6月17日）

发送范围：校领导、学校中层领导干部

淮阴师范学院发展规划处、高教研究中心联系方式：

网 址：<http://www.ghc.edu.cn>

办公地点：办公楼 6 号楼 101 室、102 室、103 室

联系电话：刘爱东 83525996 葛军 83525596

皮 武 83525568
